

## 4.11 错误信息和信息疫情

错误信息是指不考虑误导意图而传播的不正确信息。虚假信息是指故意传播的错误信息。例如，政敌或外国政府可能会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的而参与传播虚假信息，如选举优势或破坏公众对民主制度、独立媒体和科学知识的信任。有组织的团体可能出于其他目的，如赚钱或推进某种意识形态。由于很难证明传播的意图，所以我们在本文使用“错误信息”一词。虽然错误信息已经伴随我们几个世纪了，但互联网已经改变了它的规模、驱动因素、后果以及可能的应对措施。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期间，人们开始使用“信息疫情（infodemic）”（或“错误信息疫情（mis-infodemic）”）一词来捕捉病毒的快速传播和COVID-19相关及其预防、管理和减轻经济和社会影响措施的错误信息快速传播之间的相似之处。现有与疫苗有关的错误信息往往在COVID-19疫苗上市后被重新控制，并发起了许多新的反疫苗接种活动。

2020年，由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资助，可持续发展宽带委员会（Broadband Commiss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发布了一份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同时打击数字错误信息的报告。(12)

该报告描述了错误信息生命周期的五个阶段：



煽动者和受益者，出现了关于动机（和上述目标）的问题



代理人，出现了关于技术的问题，如机器人和伪造帐户或虚假身份



信息，涉及形式的问题，其中三个常见的形式是：

- 情绪化的主张和叙述，其通常混合了情绪化的语言、谎言或不完整信息、个人观点和真相要素
- 伪造、去语境化或欺诈性修改的图像和视频，以及合成音频
- 虚构的网站和已污染的数据集



中介机构，出现了关于平台（如暗网、社交媒体、消息和新闻媒体）和正在被利用的平台功能（如算法和商业模式）的问题



目标人群和解释者，出现了关于谁受到影响（例如，公民、科学家和记者等个人；研究中心和新闻机构等组织；黑人社区和原住民族等社区；以及选举流程等系统）以及他们如何应对（例如，通过忽略或分享揭穿错误信息）的问题

该报告将错误信息与模仿和讽刺区分开来，模仿和讽刺既可以误导那些没有能力识别错误信息的人，也可以通过强调错误信息的荒谬成分进行反击。

可持续发展宽带委员会的报告也提出了对错误信息的潜在应对方法，并提出了与言论自由权利交叉的例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指出了这些应对措施的潜在互补性，并指出有必要确保所用任何应对措施的一致性。

### 监测和事实核查

- 包括对错误信息的监测和揭露（例如，被推翻的主张）以及对新的主张进行事实核查
- 由独立组织雇用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进行判断（即使有自动化的帮助）可减少侵犯言论自由权利的风险

### 可靠度标识

- 包括内容验证工具、网络内容指标、标示（指向可靠的证据来源）和网站可信度标签

### 教育性

- 包括培养公民的媒体和信息素养（例如，批判性思维和数字验证技能）以及记者的信息素养

### 策划性

- 将用户指向官方可信的证据来源，供新闻媒体、社交媒体、讯息通信和搜索平台使用
- 可能被误用为一种私人审查形式

### 技术和算法

- 涵盖可以识别错误信息、提供附加环境并限制传播的人类学习、机器学习以及其他人工智能方法
- 上诉过程的自动化可能会侵犯言论自由权

### 反错误信息运动

- 包括专门机构制订挑战错误信息的反击言论，并动员线上社区传播高质量证据

### 规范性

- 通常由政治和社会领导人公开谴责错误信息行为，并提出相应解决建议

### 经济性

- 包括广告禁令，特定内容（例如COVID-19内容）去货币化和其他消除促使错误信息产生的方法

### 立法和其他政策

- 包括将错误信息行为定为犯罪，指导互联网通信公司删除内容，以及为可靠的信息来源提供物质支持
- 可能会被滥用于削弱合法的新闻报道并侵犯言论自由权

### 调查性

(可为立法和其他应对措施提供信息)

- 检查煽动者、传播程度和手段、涉及的资金以及受影响的社区

尽管存在许多这样的证据综合，但该报告并未涉及支持这些措施的证据。例如，一个较早的中等质量证据综合（AMSTAR评分7/11，检索时间为2017年）发现：纠正错误信息（即措施1）对错误信息的相信有一定影响（对健康的影响比对营销或政治的影响更大）；反驳比预警更有效；呼吁一致性比事实核查和呼吁可信度更有效。(13) 此处目的并不是提供关于这些措施的知识现状，也不是探讨可能支持这些措施的错误信息心理学，而是表明已有错误信息应对措施的证据综合，同时需要动态证据综合。动态证据综合可以提供对已知情况不断发展的理解，包括如何因群体（例如，更容易受到错误信息影响或持有特殊信仰体系的群体）和情境（例如，两极分化的社会）的不同而变化。

正如我们在背景中所讨论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为使用证据培养能力、机遇和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是为解决关于社会挑战的错误信息），同时运用判断力、谦逊和同理心，那么其结合将很好地为我们服务。即使我们依靠卫生部门常用的严格评价和可靠的自我校正系统，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正如Ross Douthat在其莱姆病生活回忆录中所观察到的，我们需要更多具有以下两种世界观的人和机构：1) “接受现代科学的核心成就，至少对民粹主义信息源和权威机构源持相同的怀疑态度，并拒绝盲从”；2) “认识到我们的机构在各个方面的失败，有更广泛的、符合当前学术官僚路线的经验……”(14) 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医学等领域受益匪浅，这些领域结合了严格评价和相当可靠的自我校正系统。但像Ross Douthat这样的人却没有，他指出：“与七年前相比，我对宇宙的态度更加开放，对任何声称共识的东西都更加怀疑。但我试图不让这种开放和怀疑的混合演变成偏执的局外人群体思维。”(14)